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五一期 ——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5c)

【人物访谈】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章剑锋
【当事者言】	江青的生活方式	杨银禄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三）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访谈】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 章剑锋 •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休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

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 参加写作组

《南风窗》：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风窗》：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南风窗》：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写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南风窗》：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 高处不胜寒

《南风窗》：您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风窗》：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

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南风窗》：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一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南风窗》：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 评说“上海帮”

《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近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

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 回看向来萧瑟处

《南风窗》：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自由。退出来了，倒了霉了，我也并不感觉自己见不得人。就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摸摸良心，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当常委、委员，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没有跑过官，上面定的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为毛泽东做事，觉得很光荣。因为当时很多相当重要的事情，都是从毛泽东那里下来的。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没关系。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在我老师一辈里，也是这样的，尽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愿意不舒服不开心，但到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比如周予同临终以前的陈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得失在一整个大的运动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则的话，你反而给人家小看了。

《南风窗》：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无可奈何？写作组是实践你们的抱负的平台吗？

朱永嘉：写作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做一点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现实终究是现实，你要在学问上能够有所创见、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人家高兴听你，不高兴由人，是别人说了算。你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成，环境起很大的作用，怎么做，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行人听天命，你不过就是行人罢了。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一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

面扮演了一个角色。知识分子的光彩不在权力上面，要是硬往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结果的人不会很多。这片土壤上，他们没有办法生长。权力结构上卑鄙龌龊的事情太多了，你没办法在这块土壤上很好地生长，要么你就随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你要想拼命往里面挤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里面挤，还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余地，有的问题可以退出一点。

《南风窗》：经过那段历史之后，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
朱永嘉：过去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依附于皮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除了为权力机构服务以外，独立谋生的道路并不多。在过去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做官，参与政治。孔子那时候讲儒家思想，是从官僚场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点。总体上来讲，他是离不开这张皮的。

□ 《南风窗》2010年第8期
~~~~~

【当事者言】

江青的生活方式

• 杨银禄 •

◇ 一日生活如此过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

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仿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 ◇ 江青实在难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仿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

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 ◇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江青有“四怕”。

#####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仿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

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江青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 ◇ 随心所欲独往来

林彪说 he 自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实江青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红卫兵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中央领导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江青听了以后，多次约上康生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

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时，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好玩儿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有四五十个品种。我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拿回来给她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儿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江青的情绪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她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她说：“这副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她到了碧云寺以后，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4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江青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江青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

像摘下来！”

三是江青看到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她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吴德列席了会议。江青质问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江青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眼，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小售货员被吓得不但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江青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对方又退了一步。这时江青火儿了：“我来看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江青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的，又给吴德同志打电话，把当时情况讲了讲。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4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派了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4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儿，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开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 ◇ 自掀面纱露峥嵘

江青是一个非常爱出风头的人。1970年5月的一天，江青提出要到颐和园欣赏牡丹。我们工作人员出于对她的安全的考虑，向她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正是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的季节，你要求到户外活动活动是好事，但是，我们事先没有通知颐和园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游园的人很多，你在那里活动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是不是改个日子再去。”

我们没有想到特别怕见生人的江青却说：“没有关系，我这正是接近群众的好时候，叫群众认识认识我也好嘛。我马上就走，快点儿给我调车。”

汽车行至北京大学南门时，工作人员又提醒她：“现在颐和园正门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是不是进东南角的旁门，这样比较安全。”

江青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进正门，人多怕什么？人不多我还不来呢！你们这些人太不理解我了。”

我们听江青这样一说，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她到如此热闹之地的目的，不只是专门为了赏花（因为钓鱼台10号楼楼前就有一片品种相当好的牡丹），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

5月的北京春风拂面，颐和园的湖面碧波荡漾，岸边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来此游览的客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江青进入颐和园，随行人员前呼后拥，威风浩荡。

游人们漫步的漫步，说笑的说笑，留影的留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江青的到来。

在这样的情景下，对于做警卫工作的人来说，是好事，不用疏导群众，不担心发生问题，江青本人也可以自由专心地观赏风景。

但是，这时江青沉不住气了，故作姿态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抬起头，挺着胸，时而

走得很快，时而走得很慢，以引起有人对她的注意。工作人员紧跟不舍。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被人注意。这时我看到了江青脸上的失落感。

这个时候，江青想出了一招——群众不是没有发现我吗？我来了自我暴露。

当她走入雕梁画栋的长廊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嬉逗一个四五岁的可爱的小男孩。

江青突然停下脚步，俯下身子笑嘻嘻地对小孩说：“小朋友，你几岁啦？叫什么名字？你认识我吗？我是江青。”

说着说着，就伸手抚摸小孩细嫩的小脸。

江青自己也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认识她呢？她是故意给孩子的母亲及游人看的、听的。

孩子对江青一连串的问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

年轻的母亲也被弄糊涂了，没有仔细看江青一眼，还以为遇上了一个疯子，抱起宝宝就要走。

江青觉得十分尴尬，就对着孩子的母亲大声地说：“我是江青，你们没有听说过江青的名字吗？”

她生怕人们还认不出她来，又补充说：“你们看，我就是江青。”

这时，年轻的母亲认出来了，周围的群众也认出来了，“对对对，是江青同志。”有人在低声议论着，很多人围拢上来。

这时，江青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脸由长变圆了，笑着，拉着长长的颤抖的声音对周围的群众说：“同志们好！我今天是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同游同乐来了，祝你们精神愉快！”

人群中有一人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

大家也附和着高喊。

江青顺着长廊由东往西走，作出一副平易近人模样，一边走一边对两侧的游人打着招呼：“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这样出风头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71年的盛夏，江青到青岛避暑，开始几天，她的心情特别好，活动频繁。白天逛公园，去栈桥，下海游泳，做沙浴；晚上看电影、打扑克。

有一天下午，她为了显示她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旗手”的风采，在没有任何准备警卫部署的情况下，游览了青岛市的中心公园，后又来到海边。

海滩上人山人海，栈桥上人流如潮，江青走进海中间，向周围的群众高喊：“同志们好！



我是江青，我今天是特意看望大家来啦！”

大家听到“我是江青”的自我介绍，四处张望寻找哪位是江青。当大家认出江青以后，几百人向她围拢过来，把栈桥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可忙坏了警卫人员。警卫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了一条通道，开进几辆汽车，江青很不情愿地离开显示她风采的热烈场面，勉强地钻进一辆汽车，我们工作人员也随即进了另外几辆汽车。因为人太多，我们挤了一身汗水，想摇下汽车窗子的玻璃通通风。

有的群众贴近车窗，想往车内看坐的都是什么人。突然有一个中年男子从人群后面冲过来，憋足了劲儿，往一辆汽车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浓痰，正好吐到一位工作人员的脸上。由于人太多，警卫人员只顾疏导车队，没有发现吐痰这一特殊情况。我们回到住地以后，那位挨吐的同志哭笑不得。

他一边洗脸，一边骂道：“他妈的，那个家伙本来是对她不满，是想吐她的，偏偏吐到我的脸上，真是倒霉透了。”又自我开玩笑地说，“那个人真正军人的不是，打枪的不准。”

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劝道：“你别再声张了，吃点哑巴亏吧，如果此事叫她（指江青）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这位挨了一口痰的同志说：“我晓得，‘伤’了我一个，救了许多人，吃哑巴亏，值得。”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气火热。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办公，打铃叫我。

当时，我正在整理登记刚刚由中央办公厅秘书送来的文件，听到铃声，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进入她的办公室。

我看到江青坐靠在沙发上，右手拿着一份文件正在闭目养神。

她听见我进去，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对我说：“小杨，现在城里天气很热，有的同志对我说，八达岭和十三陵比城里凉快些，你马上派人给我打个前站，看看路线，准备一个吃住的地方，我想到那里看看，消遣一下，并在那里住上几天。”

我听了以后，耐心地对她说：“你想活动活动，精神放松一下是件好事，据说到那里参观游览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和外国人，你到那里消遣，行动可能不大方便。”

我的意思是劝她最好不要去那里。根据以往的做法，她要说的话，参观景点就不对游客开放了，这样社会影响不好，也影响景点的收入。

江青听我这样说，立刻收起微笑，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我到那里去会影响他们什么？我去了只会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不会产生坏的影响。你是不是认为我去了，他们就不对群众开放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我告诉你，我的精神和身体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更重要，党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损害，就是党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在我这里工作这么久了，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得？况且，我去了以后，我江某去的消息一传开，会给他们带去更大的利益，这叫做无形资产，你懂吗？我去时，对人民群众可以照常开放，我还想见见群众呢！怕什么？当然喽，为了我在那里活动时的方便、安全与安静，可以叫他们竖一个牌子，写上‘内部修缮，暂停游览’几个字不就得了。今后你记住，你们对我说的话是不允许打折扣的！你快去办，越

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儿在八达岭上看日出、照相。”

我想，对江青的意见不能作过多的解释，点到为止。因为对于她提出的行动计划，很多时候周总理都不好阻拦，何况我呢？

我只好说：“好，我立刻叫大家去做准备工作。”

我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江青同志，从这里到八达岭有六七十公里，路比较远，又不好走，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

这时，她又有些高兴了，说：“那好办，调一列专列，在火车上载上我的汽车，把我骑的马和我用的被褥、马桶等物也都带上。我坐火车去，下了火车可以坐汽车，也可以骑马嘛。这叫做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江青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其中就喜欢骑马。她在延安时学会了骑马，经常策马飞奔，扬起串串尘埃。以后她对在延安骑马时的威风念念不忘，经常拿出那张骑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十足的照片给我们看，并夸耀自己的骑术如何了不起。70年代，她又想骑马消遣，多次提出骑马的要求。于是，警卫部队从马队中给她挑选了4匹马供她使用。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立即召集10号楼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商量给江青带些什么东西，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并作了详细分工。我又分别给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打了电话，请示调专列及安全保卫。

到晚上10时左右，江青到八达岭、十三陵去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凌晨两点多钟，江青动身到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奔向八达岭。因为是夜间行车，又是上坡路，火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车开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达八达岭已是早晨5点钟了。火车停稳以后，我们把江青的汽车开下火车，马匹也从火车上赶下来。

车停了10分钟左右，江青从车厢来到站台上，准备上长城。

虽然当时是7月炎热的季节，但是关外的早晨还是比较凉爽的。

江青由两位警卫战士扶着骑上了一匹高头大马，一位警卫战士牵着缰绳，另有3位骑士在其周围保驾，江青显得神气十足。几辆轿车紧跟其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地来到长城脚下。

江青很麻利地从马背上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还是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

她停顿了一下，拉着长长的声音说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天来到这里，应该是不到长城非好女呀！”

江青说完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登长城了。

她在北京市领导同志、长城管理处的领导同志及其他陪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她一边攀登一边说：“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还修了如此雄伟的万里长城，抵御了外敌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长城，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有的历史学家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这种说法不对嘛，‘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嘛！你们晓得吗？搞政治的优柔寡断、心慈手软，是办不成大事的，成不了大器的，从不了政的。我就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之一。”

我觉得江青的这番话，无非想说明她自己也是政治上的强人罢了。

江青平时经常喊叫自己身体不好，这里疼那里痒，说什么植物神经紊乱啦，手脚发麻啦，出虚汗啦，腿软啦。但是，她高兴了，爬长城爬的速度很快，陪同人员都气喘吁吁，可是她像没有事似的。

有一位同志去搀扶她，被她一把推开，对他说：“你干什么？去去去！我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的，你看我老了吗？你一扶我，好像我到了人老珠黄的年龄了。我还没有老。我今天到这里来，一是想放松一下，二是想锻炼锻炼身体，没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怎么能和阶级敌人斗？”

那位出于好意的同志被江青不友好的言行弄得很尴尬，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江青爬到半高处，找了一块平缓的地方，支起了她那高级进口照相机，选好景物，对好焦距，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在她摆弄相机的时候，我发现长城下边的两侧三步一岗，两步一哨，那是北京市委委托延庆县委为保卫江青的安全专门布置的。

江青游览了长城以后，玩乐的兴致仍未减弱，骑上马来到了公路上，准备前往十三陵继续参观游览。

北京市陪同江青游览的领导同志对江青说：“从长城到十三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你是否坐汽车去？骑马的话太累了。”

江青看了看我们工作人员，意思是问那位领导讲得对不对？我们几位离她近的同志点了点头，她才不情愿地下了马，钻进了汽车。

前面有带路警备车，后面有随卫车，还有北京市领导陪同的车，最后有4位骑兵，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向昌平的定陵进发了。

到了定陵，打前站的同志引导江青走进事先为她准备休息的房间。在那里摆好了沙发，铺好了床，固定好了马桶。她稍稍休息以后，服务人员给她端来了热饭热茶，供她享用。

江青疑心很大，到外边一般情况下不吃不认识的人做的饭菜，这一天是她的厨师程汝明亲自到定陵为她做的她喜欢吃的午餐。她可能是玩儿得累了，肚子也饿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呼呼地睡了一个多小时。

江青睡了一觉醒来，在护士的帮助下洗了一把脸，又来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接着走进出土文物陈列室参观。她对一般的陈列品不屑一顾，当走到从定陵出土的风冠跟前时停下了脚步，右手摘下近视眼镜，左手扶着保护风冠的玻璃镜框，弯下腰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阵。她对一位女讲解员说：“小同志，我的眼睛不太好，隔着一层玻璃看不清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拿出来

给我看看？”

把这种珍贵文物随便拿出橱窗是违反规定的，讲解员看了看定陵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心领神会，立即点头示意赶快拿给江青看。

讲解员马上找来钥匙打开橱窗，小心翼翼地把凤冠取出来，双手轻轻地递给江青。

江青双手接过凤冠，捧着端详半天，赞不绝口：“这个东西还是真不错的，你们来看看这花纹多么美呀，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真是能工巧匠。我能不能戴一戴呀？”

对于她的话，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她说着就戴在了自己头上，洋洋自得地问周围的陪同人员：“你们看，我戴上凤冠好不好看？”

大家说：“好看，江青同志戴上它挺好。”

众人一吹捧，她更来劲儿了，拿着架势又走了几步，“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位同志在我身旁小声说：“她这几步还真像演员在演戏。”

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不让他说了，如果叫江青听见就不得了了。江青停下脚步，得意地摇晃了几下脑袋，把凤冠摘下又戴上，她的这种动作反复地做了好几次，最后还是遗憾地摘了下来，恋恋不舍地递给讲解员，然后摇了摇头说：“这东西太沉了，戴一天还不压死人？看来皇后也是不好当的呀！不好当是不好当，但是谁不想当皇后呢？当了皇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威风八面呀，受皇帝的宠爱和保护，如果皇帝早逝的话，皇后的权力可大哩！皇后在宫里是极受人尊敬、使人羡慕的人物。”

参观了出土文物陈列室，江青进入地下宫殿。这里是明神宗万历（朱翊钧）的墓穴。在幽深、阴暗、神秘的棺椁旁边，江青凝视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周围的陪同人员说：“古代皇帝活着的时候，住在高大宽敞、华丽庄严的宫殿里，那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皇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以后还躺在这样坚固宏伟的地下宫殿。这里是埋葬皇家死人的地方，按照迷信的说法，我今天不应该来到这个皇陵的。当然喽，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活着的时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死了以后，火化成灰，赤裸裸地来到世上，又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嘛。”

江青从地下宫殿出来，揉了揉由于光线反差太大而有些不适的双眼，环视了一遍周围的美好景色，问那位北京市的领导：“主席来过这里吗？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呀！”

那位领导非常了解情况，回答说：“毛主席没有来过这里。1958年4月，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后，曾经想到这里参观地下宫殿，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长陵大殿以后，高兴地说：‘十三陵是个好地方，那个朱梁是真有眼力哪，可惜让他做了陵园了’。他们出了陵园大门后，突然改变了参观地下宫殿的计划，乘车回去了。以后，毛主席再也没有来过定陵。”

江青可能是过度兴奋以后感觉劳累了，她闭目坐在院中一张长条椅子上养神，并不断地打着哈欠，或许她根本没有听见这位领导同志的回答。

她无精打采地说：“我今天玩儿的还是高兴的，达到了休闲、放松、锻炼身体的目的，现在觉得有点累了，该打道回府了。”

说完她钻进汽车就走了。

晚上11点多钟，江青回到钓鱼台17号楼，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后回10号楼休息。

江青的这次活动，路途虽然不算远，但是惊动了方方面面。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惊动了铁道部、北京市委、中央警卫局、北京公安局、交通局、旅游局以及八达岭、十三陵的负责同志，动用了火车、汽车、马匹等交通工具，真可谓“江青出朝，地动山摇”。

#### ◇ 文革时期江青的生活作风

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从艺时的私生活据说有不少绯闻。由于那些绯闻不是我所见闻，不知真伪，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

自从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没有绯闻出现了。可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江青有“三假”，什么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说什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甚至还有一位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

关于传说江青有“三假”的问题，我作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的工作人员，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没有“三假”，而都是真的。她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护士看到“三假”的传说后，都说：“这样胡编滥造，无聊，真无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

关于传说×××“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的问题，就更子虚乌有了。我跟×××很熟悉，他今年以来身体不太好，我知道后打电话向他表示问候时，顺便问了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的身体虽然很虚弱，还是气愤地大声说：“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江青住在钓鱼台几号楼我都不知道。”

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为了证实，我特作4点说明：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了子宫颈癌，到苏联做了痛苦的放射治疗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严重地破坏了她的正常的内分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就不能做那种事了。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来的；如果她干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三是，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江青的身份、地位、权力在文革中是极为特殊的，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脸，事情一旦败露，谁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这就说明，谁也不敢做那种事。四是，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

以上4点表明：她不会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没有机会做那种下流的事。

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照相的问题，可能是误认、误传。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即使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假照片。因为江青游泳的时候需要安静，不准无关人员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跟随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护、服务任务的警卫员和一名值班的护士，别无他人。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从来没有见过她游泳。我认为，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离他们越远越好，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张春桥、姚文元了解江青比我们工作人员了解得更多、更透，他们应该说机警得很，怎么会、怎么敢和江青一起游泳呢？他们怎么会、怎么敢身穿游泳衣与江青拍出“嬉戏”、“丑态百出”的合影呢？

因为我没有亲自到过江青游泳的现场，我的看法仅仅是一种分析，还不能作为论据。为了证实我的分析，我曾经问过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周金铭，详细地了解过江青游泳的情况。周说：“文革期间，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江青游泳时都是由我陪同，并负责她的安全；另外还有一名护士，负责对她进行护理，帮她洗澡和更衣，没有见过别人和她一起游过泳。无论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从来没有陪同过江青游泳，怎么会有那么一张照片呢？”对此他也认为很奇怪，很不好理解。

“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先后有30余人次，大家都认为江青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她的生活作风是严肃和守规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轨行为。

历史是一门科学，最讲真实性，无论事大事小，都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好恶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即使是对林彪、江青这样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也要客观、公正、如实地记载，不能任意泼脏水，以取悦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讹传讹。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和社会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引起理论宣传部门和历史研究部门的重视。

□ 《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三）

• 舒 云 •

75、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林立果了吗？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这可非同小可，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会见”，说明黄永胜可能知道内幕，最起码知道“两谋”。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回忆9月12日那一天。因为也是没几天的事情，经过反复回忆，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想抱个“大金娃娃”，听了费四金的交代，顿时大失所望。但仍不死心，又专门提审过费四金多次，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竿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就是没接见，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

能作伪证。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也非常明白如果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黄永胜被抓后，费四金也被抓了起来，黄永胜是保不了他了。他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而且还会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费四金坚持，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专案组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门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好多人都众口一词，说黄永胜那一天见林立果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门的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这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写的，是伪造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是事后追记的，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情况。

最后，纪登奎又使出一招“杀手锏”，他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是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了事，就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定黄永胜罪时才无法写上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将像林彪背着“伊尔库茨克”的罪名一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由此可以想见，有些“证据”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了。

76、黄永胜9月13日是准备去广州吗？

中央专案组说：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坚决否认。

费四金说，1971年9月12日那天，根本就没有说第二天去广州，不要说换洗衣服没有准备，就是天天要吃的药也没有准备。中央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讲，瞒谁也瞒不过我小费。因为出差在外，不是一天两天，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把吃的药准备好。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过，肯定黄永胜没有出差的打算，更不知道到广州。

9月12日傍晚黄永胜去人民大会堂是费四金跟着去的，一直到第三天才回来。黄永胜回到西山，烧了些文件。费四金只是觉得黄永胜的情绪低落，但他一直不知道是林彪跑了，只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吴法宪那天没有到人民大会堂来。黄永胜的秘书吴秘书那天没去人民大会堂，问小费都谁参加大会堂的会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直到9月24日，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被关进了学习班，才知道原来黄永胜有问题，他也有了问题！

正像费四金所说，他并不是黄永胜的“心腹”，比起李文普和林彪的漫长关系，费四金和黄永胜要短得多。他原单位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1968年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他也跟来了，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警卫参谋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一些经济账没交。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了手，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

火车票也退了，这一“临时”就是四年。先是关在亚疗一年，然后关到团河农场三年，放出来后，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

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哪里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9月12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遭遇，但费四金和他亲爱的妻子至今不悔。

小费不知道，因为他，使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免遭噩运。

最近，我又见到了小费，小费已经成了老费。他拿出他的结婚证给我看，说他现在退休了，和他爱人经常自驾车到全国各地旅游，非常快乐。

7 7、郭玉峰为什么说黄永胜最冤枉？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李震是中央专案组的两员大将，他们在纪登奎的领导下，纪登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林彪案情。

郭玉峰认为：“林彪手令”不一定是林彪写的，元帅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两谋”（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这么大的事情，叫小娃娃干？为什么不叫黄永胜干？郭玉峰说最冤枉的是黄永胜。为什么郭玉峰说黄永胜最冤枉？因为郭玉峰参加“两案”审理，最知情。

9月24日，黄永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此失去自由。被抓时，黄永胜大叫冤枉，那声音很多人都听到了。确实冤枉，确实比窦娥还冤啊。

没几天，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也被关了起来。

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的黄春光回忆：

9月13日我一上班，值班参谋说，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与林家有关，按一等专机准备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9月14日、15日晚上，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给我打电话，你快过来，出大事了。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爸出事了，让咱们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我想说我知道我父亲的事会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的事，又会把我怎么样，当时真不知道要把我怎么样？我从侧面分析，我帮助父亲烧东西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因为走廊有两个门，23时多，秘书看见我帮着我爸烧东西，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的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我说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这些干什么？策反信毛主席不是批过了？批过了也一样可以抓。

我被关了四年，在团河一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都被关在亚疗。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我认为，父亲不知道林彪为什么跑？如果知道，一是不同意这样干，二就是同意干，也不会干成这样，这证明林彪不是自己想走的。

放出来重新分配工作。本来我是副团级，分配到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任副队长，我问处长，是队长、指导员管我，还是我管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干长，没多久让我转业，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要去看。谁告诉说可以看，母亲劳改，去不了。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故意不见。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里人，也不知道家里人的消息，他能不能想见吗？但父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见。

我们既然来了，好不容易来了，不見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那里呆了两三天，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见见，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媳妇，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里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像老了几十年，他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好几次监，每次半天。

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不是他胡说，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林彪惟一批的就是严慰冰，那是因为严慰冰写了很多攻击林彪一家的匿名信。而父亲没签过任何一个打倒谁的文件，要开除彭德怀党籍，父亲领导的专案组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专案组边请示边转上去，这就算迫害？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完全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与他们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这在当时中央都知道，江青甚至反对我父亲出国访问。在“两案”公开审理的审判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1年，父亲在青岛一年半，我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1983年春节前发现肺癌，4月父亲去世。临死屋子里连冰箱也没有，只能到外面买些冰，把没吃完的饭冰上。父亲没写东西，不写。我说人家相信吗？写什么？一生认为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几小时的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

临死黄永胜只讲了两句，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